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亲历者言】	文革中我给江青做秘书（一）	阎长贵
【史海钩沉】	隔离审查时的四人帮主要成员	汪文风
【理论研究】	超极权：文革研究纲要（五）	吴 思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亲历者言】

文革中我给江青做秘书（一）

· 阎长贵 ·

一、戚本禹推荐我给江青做秘书

文革中，我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任命的江青第一任秘书（负责收发和管理文件的机要秘书，以下简称“秘书”）。在我之前，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或许有人，如警卫员被人称过秘书，或者也兼做过一些机要秘书的工作，如收发文件等，但其身份和职务不是机要秘书。此外，也确有人给江青做过一些秘书工作，如戚本禹帮助江青看过群众来信等，但他主要的工作不是给江青做秘书，只不过是顺便代劳。因为江青在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以前，除了给毛主席做一些秘书工作外，没有什么实际职责，因而办公厅没有给她配备专职秘书。

江青有秘书，是文革开始以后。在文革十年中，江青先后有四任机要秘书：第一任是我，从1967年1月9日到1968年1月9日；第二任是杨银禄，从1967年10月到1973年6月；第三任是刘真，从1973年6月到1974年4月；第四任是刘玉庭，从1974年2月到1976年10月（逝世于2003年“非典”）。

我担任江青的秘书，不是江青指名要我，也不是我毛遂自荐，是当时组织安排的。在这个问题上，戚本禹可能起了主要和关键的作用。我给江青当秘书是戚本禹推荐的。

陈伯达被审查时写的材料中说我给江青当秘书“可能是关锋介绍的。”（见《陈伯达遗稿一狱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95页）

这个推测事出有因，因为文革前我在《红旗》杂志社工作，一直是在关锋的直接领导下，是关锋的部下和学生。其实关锋当时是不大赞成我给江青当秘书的。在我已担任江青秘书后，他有次见了我，跟我说，“你政治上弱，不敏锐，不适合给江青做秘书。”所谓我“政治上弱”，有件事我记得很清楚——1966年2月，彭真主持制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问题的汇报提纲》（又叫《二月提纲》）。在一次讨论会上，我说，《二月提纲》很

好，说明中央重视学术讨论，制定和颁发关于学术讨论的文件，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对我这种看法，关锋批评我没政治头脑，看不出问题之所在。他问我：“谁是学阀？”我回答不出。

极力推荐我给江青做秘书的是戚本禹，这是戚本禹当时亲口告诉我的。

1966年冬的一天，我和戚在钓鱼台院子里散步，他跟我说：“江青想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比较粗。我看你还比较细，我推荐你去给她当秘书。”

我说：“不行，我没当过秘书，不知道怎么当。”

他说：“不知道不会学吗！收发文件你不会？挑选文件你不会？只要细心就行。反正我已经向江青推荐你了。”

当然，我给江青当秘书，也不是戚本禹一句话；后来汪东兴告诉我：“你的档案是我审查的，你给江青当秘书是我挑来的。”我给江青当秘书还要过中央办公厅这一关。

无疑，最根本和最重要的环节还必须是江青同意接纳我；而在这方面，戚本禹的推荐和介绍我想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当时，就了解我而言，在比我高一层的人当中，除了关锋就是戚本禹了。而且我当时就在戚本禹手下工作。这次谈话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十天或半月左右，1967年1月9日晚上，——这个时间我记得很清楚，戚本禹到我当时工作的房间来（他的办公室就在我住的隔壁），兴冲冲地跟我说：“已经定了，调你去给江青当秘书，现在就搬到她住的十一楼去！”我马上整理了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具，就跟着戚本禹去了。从这时起，我离开了工作五六个月的钓鱼台十六楼，搬到江青当时住的钓鱼台十一楼，开始了给江青做秘书的工作。

究竟经过怎样的推荐、审查和决定，其具体过程我一点不知道。后来听到一个情况，就是当时有四个人参选，我是其中年纪最小的，29岁，参加工作年限最短的，5年，级别最低的，行政22级，工薪收入最少的，56元。

给江青当秘书这个事怎么落到我头上了？

事过30多年后，我准备写回忆录时，才想了解一下。于是，我往上海拨通了戚本禹（他改名戚文）的电话，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当时具体怎么谈的和谈了些什么也记不清楚了，但是不管怎么谈、怎么说，大概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是少不了的：

- 第一，家庭出身好，社会关系简单、清楚；
- 第二，政治可靠，工作认真负责；
- 第三，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写的文章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

关于“政治可靠”的含义和界说，现在和文革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而言，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其中自然包含着严重的个人崇拜成分。我个人这些条件，再加上我在文革中的表现，我被选做了江青的秘书。

我在做江青秘书前，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江青办信组工作，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江青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后，各方面的来信，特别是社会上群众给她写的信一天多起来。江青本人看不过来，首先由戚本禹帮助她看和处理，到1966年7月中下旬，戚本禹把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的梁川借来帮助他。我是文革初期，6月3日，戚本禹把我从《红旗》杂志借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7月4日，他又把我带到钓鱼台，安排在中

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到8月中旬，戚本禹叫我离开简报组，协助梁川办理江青的群众来信；不久，梁川回秘书局信访处，由我独立承担江青信件的处理。

到了8月31日江青以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主持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以后，给江青的信猛增到一天几百封，上千封，甚至有时一天达两千多封，每天都是用麻袋装。就在这种情况下，调人组建了江青办信组。人员扩大到七个人，由我负责。人员构成：《红旗》杂志社2人，马列主义研究院2人，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1人，军队干部2人，其学历大多数是大学本科（还有研究生），军队干部一个是连指导员。从人员构成来看，应该说，这是一个有相当文化水准的办事机构。

大概与此同时，也调进二三十人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信组，地点设在距离钓鱼台三四里路的花园村，处理大量给中央文革小组的群众来信，其中有几个人专门处理给组长陈伯达的信。

江青办信组设在钓鱼台十六楼，即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后改称办事组）所在地，直接归戚本禹领导。专设江青办信组，虽有实际的需要，但也表明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地位的特殊。

我在江青办信组怎样工作？

戚本禹在文革前当过多年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科科长，有经验，他告诉我对江青的群众来信，基本上分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必须送给首长看的，这是指首长亲属、朋友和熟人来信以及关于重大、重要问题的来信，而凡属于送给首长看的信，都要做出摘要并附原信一并送阅；这样的信每天至多只能选3—5封；

第二，根据信中所述问题的性质，转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包括林总（林彪）处、总理处、各副总理处、各部委、各省市等等；这是最大量的，大概占有所有信的99%以上；

第三，凡是反对和攻击首长的，都转公安部，由公安部处理。

戚本禹还说，不好处理的信，你拿不定主意的，可随时问我。他特别嘱咐，江青同志的群众来信一定要处理好，从中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说实在话，当时我们全组同志都是怀着热爱毛主席和崇敬江青的心情来对待这项工作的，十分认真，十分负责，不怕苦，不怕累。中央部委和各大行政区，每人负责一处，平均说，每天每个人要处理二、三百封信，当然绝大多数粗粗一看就能定了，比较仔细看的也就几十封。信的内容很庞杂，各种各样的都有，有伸冤的，有告状的，有反映情况的，有揭发问题的；有公事有私事，有大事有小事，有历史问题有现实问题，如此等等。

当时我分工处理中央各部委的来信，除此之外，我作为负责人，还要从各人送给我的比较重要的信中选出3—5封作为送给江青看的。当时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甚至加班到十一、二点钟，十分紧张。而当时在一种政治狂热情绪支配下，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谁也不说什么。

在我负责江青办信组四五个月的时间里，没受过江青的批评（也不记得是否受过表扬了），大概她还比较满意，这恐怕也是她接受我给她做秘书的一个原因。在这一段时间里，我还结识了李讷。

李讷——江青和毛泽东的女儿，我比她大3岁，都是大学毕业，我学哲学，她学历史，有共同语言，关于文革观点也一致，谈话很投机，经常在一起聊天。有一次，我和李讷两人在离文革小组成员会议室不远的一间屋子聊天，江青和陈伯达走进来，江青说：“你们两个出去，叫我们两个谈。”——至于他们两个谈什么我当然知道了。

李讷有一天晚上很晚还没回到钓鱼台，江青很焦急，怕出事，我和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王广宇奉命开着车到处去找她。我因为给江青办信，信中谈到江青的某些情况（当然不包括骂江青的），我有时也跟李讷说一说。有一次一封信中寄来一张江青三十年代的照片，不是剧照，我拿给她看，她脱口即说：“漂亮的小妈妈！”在李讷看来，妈妈比她长得漂亮。我觉得这是实话。从形体和相貌讲，李讷七分像毛泽东，三分像江青。她还跟我说：“别人是严父慈母，我可是严母慈父；我不怕爸爸，有时却怕妈妈。”我对李讷印象不错，她对我印象大概也可以。直到后来我做了江青的秘书，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选我做江青的秘书，李讷恐怕也起了推动作用。

文革后，我和李讷仍然保持联系。

逢年过节我常去看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个春节，我去看她时，见了我，寒暄后，她立即向她丈夫王景清介绍：“他是给母亲做秘书的人。”王景清接着说：“你辛苦了！”看来他也知道我受江青迫害的事情。往事如烟，弹指一挥，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和李讷如今都是接近和超过80多岁的老人了。

## 二、向江青报告批判陶铸的群众来信

我在给江青办信组期间，就和江青有接触了。

大概从66年8月，戚本禹调我专职为江青办信以后，我就有机会常与江青见面。当时给我的印象，她待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态度还蛮平和，见面时往往还主动和我们打招呼。没有像后来大家所感受到的那种居高临下、不近情理、变态、迫害狂的做派。

在我给江青做秘书前，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后称办事组）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我诚心诚意地接受和相信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接受和相信他关于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认为中央真地出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悬在头上，社会主义红色政权处在危机之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修正主义，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就是保卫社会主义红色政权。心想：“夺取政权，咱没赶上，保卫政权，决不能落后。”

我以非常积极的态度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正式开始时，1966年3月份我就积极参加了戚本禹组织的批判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活动；我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后，1966年12月份，我接受戚本禹的指派，去找地质学院的造反派，布置他们到四川揪彭德怀元帅，如此等等。直到现在，我一想起当年自己所做的这些事，就感到心痛。

在这里我再谈一件和江青有关的事情，这就是我积极支持贴陶铸的大字报。

最早贴陶铸大字报的可能是上海某中学的一个高中生。他除了受当时极左思潮影响外，还可能受当时批“三家村”的直接影响，专批陶铸的两本书《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写有一万多字，贴在北京东城沙滩北街2号中宣部院内。对这张大字报我听说过，不记得是否看过了。

还有一张很有影响的批判陶铸的大字报是我直接支持的。大概是1966年12月上、中旬，我的一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大学同学和他们单位的几个人，寄来一份材料，题目叫做《陶铸同志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其中历数陶铸从1966年6月到中央工作以来各次讲话的内容，指责陶铸：（1）是中央某些机关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关键人物；（2）是扼杀中小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要角色；（3）玩弄折衷主义，充当极少数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物的“护法神”；（4）把矛头引向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件事，我请示戚本禹怎么办，他看后告我：“太长了，摘要送首长阅。”这份材料大概有一万多字，我让江青办信组一个字写得比较好的同志做了摘要，压缩到三、四千字，并抄在八开的稿纸上，送给江青。不几天，戚本禹把这份材料退给我，见上面写着江青落款的“送主席阅”，在“送主席阅”几个字上有个圆圈。这一看我心里明白了，我们编的材料毛主席看了。我非常高兴。

在退给我材料时，戚本禹突然问我：“他们敢不敢贴出去？”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既然敢寄来就敢贴！”戚又说：“好，告诉他们可以贴出去，如有什么事情找我。”

戚本禹对当时手握大权、地位明显高于他的陶铸，他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我想不会是他本人的决断，应该是从江青、甚至更高级别的权威那里领来了什么指示、暗示，或做了什么研究吧？

而当时我从思想到行动是紧跟戚本禹的。于是，我立即将这个意思用电话通知了我的同学，并告诉他我的电话，让他有什么情况告诉我。1966年12月19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包括我那位同学在内的五个人贴出《陶铸同志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的大字报。结果，这张大字报遭到许多人反对。大概是第二天，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位女同志给我打来电话，说我的那位同学和一起贴陶铸大字报的人受到围攻，他们的大字报被说成“反革命大字报”，还有人写出大标语：“谁攻击陶铸同志，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砸烂他的狗头！”请求帮助，并把她的电话告诉了我。我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戚本禹，他说，“好办！我收到过教育部同志的信，我给他们写封回信，你用电话告诉他们。”很快戚本禹将一封他拟好的短信给我，我用电话通知了他们，信的全文如下：

你们几次来信都收到了，谢谢你们。因忙于其它事情，一直没有答覆你们，请你们原谅。我对你们那里的事情，没有调查研究，不能讲什么意见，希望你们根据《十六条》和《红旗》杂志社论的精神进行讨论，将教育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教育阵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阵地，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用毛泽东思想占领这个阵地。关于……五位同志给陶铸同志写大字报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写的。对这张大字报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但是说这张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大字报，针对这张大字报说：“谁反对陶铸同志就砸烂他的狗头。”这是错误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人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甚至扣押他们，更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这样做。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革命，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的群众必须同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革命的群众也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压制革命。

戚本禹 1966·12·20

戚本禹这封信很厉害！一下子就把陶铸置于不受保护的地位。当时谁都知道，可以写大字报，就是可以打倒嘛！

戚本禹这封信，我用电话通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人后，他们立即抄出，贴在沙滩北街2号中宣部院内图书馆前用以张贴大字报的席棚上。这封信的作用非同小可，它立即解放了我那位同学等五人。戚本禹的信，离1967年1月4日陈伯达、江青公开宣布打倒陶铸仅半个月时间。这封信连同他导出的五人大字报，可以看作是陶铸将被公开打倒的一种信号。此后，各文教单位关于陶铸的大字报就多起来了。由中宣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造反派们组织的《批陶铸联络站》成立起来了。这是我在文革中一个很大的错误，而在当年给江青选秘书的时候，却被看作是积极进步的表现，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行动。

### 三、江青第一次和我正式谈话

我当江青秘书以后，她大约在一个多月时间内没找过我，见了面也爱搭不理。我虽然接手收发文件的工作，但把文件送给江青还要通过警卫员，江青往外发文件也通过警卫员再交给我。我感到很奇怪，感到很纳闷。我对戚本禹说：“秘书就这样当？实在没啥意思，还不如在十六楼给江青办信工作痛快呢。这是怎么回事？”

戚本禹说他也不知道。大概过了半个多月，我心里憋不住，就去问警卫员孙立志，他笑了，他说现在江青在试用你，在试用阶段，所以不理你。在这样一段时间里，戚本禹有时还派我去做些事情——因为从文革以来我一直在戚本禹手下工作，他经常派我去做这个事或那个事。

在二月中旬的一天，戚本禹问我能不能到中办秘书局去了解一下那里文革运动的情况，依照惯例，我欣然答应了。中办秘书局、中央办公厅和全国其他单位一样，文革开始后也分成对立的两派。戚本禹支持一派，汪东兴支持一派。在秘书局戚本禹支持的一派有人甚至贴出这样的大字报：《汪东兴的屁股摸不得吗？》两派斗争很激烈。戚本禹告诉我，秘书局有人受到压制，有的人都被压哭了。他说，其根本原因是汪东兴说：“秘书局的一派和机要局的一派是孪生子”——而机要局的那派已被打成‘反革命’，当然秘书局的这一派也是‘反革命’了。”

戚本禹在秘书局工作十几年，当时还兼任秘书局的副局长，他妻子也在那里工作，对那里的情况本来清清楚楚。他为什么又派我去了解？原来戚本禹想利用我这个秘书身份，把了解到的秘书局和中央办公厅的文革情况报告江青，江青如批示：“请本禹同志去处理”，这样，他去管秘书局的事情不就师出有名、名正言顺了嘛！

我根据戚本禹的意思，在一天下午到了秘书局。见了几个和戚本禹关系不错的人，了解了一些情况，有人还哭哭啼啼，表示受压得厉害，内容基本上就是戚本禹告诉我的那些。回来后，我就给戚本禹和江青写了一封信。信的抬头是：“本禹同志并江青同志”。我拿着这封信去找戚本禹。

戚看了信，说：“我不管！”

“唉，”我说：“你叫我去了解情况，我回来向你汇报，你怎么不管呢？！”

戚决然地说：“我不管！”

“你不管，怎么办？”我有些生气地说。

戚本禹突然问我——实际上是向我“将军”：“你敢不敢把你了解的情况，向江青同志报告？”

“那有什么不敢的！”——我坚决地说：“我亲自了解来的情况，为什么不敢向江青同志报告？”

接着，戚本禹又说：“在首长身边当秘书，就应该有不怕死的精神，要敢于向首长反映真实情况。汪东兴很会整人！”

并说：“江青同志是不怕死的，我也是不怕死的。”

戚本禹把我逼到“绝境”。

我当时也年轻气盛，马上离开戚本禹办公室，回到十一楼我的办公室。我把戚本禹的名字去掉，把信重抄一遍。信抄完后，又立即通过孙立志送给了江青。

江青第二天就叫我到她办公室去。我到江青办公室，江青很客气地说，来来来，你坐下。我就坐她左边那个沙发上。

江青跟我讲，你给我的信，我看到了，你讲的意见，可能是对的，我从其他渠道也听说了，但是这件事情你不要去管了。你到我这里一个月，我觉得你还可以。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交代你任务以外，其他任何人不能再交代你工作和任务。我们都是党员。你要对我负责，对党负责。你要记住，这是纪律，不容违犯的纪律。她语气很严肃。我听了也觉得很对。我向江青表态说：“江青同志说的纪律，我一定严格遵守。我一定动脑筋，想办法，努力把秘书工作做好。”

江青最后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

我离开江青的办公室，深深地感到江青这次谈话对我是很大的教育，也反映江青十分精明：她虽然没挑明，但我觉得她察觉到了我这封信不是我个人行为。江青说“从今以后，除了我交代你任务以外，其他任何人不能再交代你工作和任务”。

所谓其他人“交代我工作和任务”，除了关锋和戚本禹以外，再没有别人。于是我立即到十五楼找到关锋，到十六楼找到戚本禹，分别告诉了他们江青所说的这个要求和纪律，关锋没说什么，戚本禹说：“好，今后，你动嘴（指传达江青的指示），我跑腿。”

戚本禹没问我江青对调查报告的意见——他是聪明人，很知趣。

江青和我谈话——我考虑到我这封信实际上是告汪东兴的状。汪是毛极其信任的人，江青岂能不作利弊权衡？！

文革以来，我一直在戚本禹的手下，政治思想上也跟定了他，认为他都是对的；而且我刚刚做了江青的秘书，还不清楚汪东兴是我的直接顶头上司，还兼作毛主席和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党支部书记。否则，戚本禹叫我到秘书局了解情况，并向江青报告，我也会考虑考虑，和掂量掂量的。

（未完待续）

~~~~~

【史海钩沉】

## 隔离审查时的四人帮主要成员

• 汪文风 •

汪文风口述

王凡、刘东平整理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经部分中央领导人提议，发起组织“童怀周”编辑出版《天安门革命诗抄》的汪文风，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他刚进中纪委，恰逢中央决定把公审林彪、“四人帮”两集团前的审理工作交由中纪委办理，他便被任命为“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兼二组（负责“四人帮”案）审讯组组长，开始和“四人帮”主要成员频繁过招。

1976年10月6日，最初将“四人帮”隔离起来的时候，他们的顺序是按照其所担任的职务排列的。即王洪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排第一号；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排第二号；下面是江青、姚文元。虽然，有人认为他们中张春桥最为阴险，老奸巨滑，一旦篡党夺权阴谋得逞，他一定会弄死江青的；也有人推测，毛远新可能会成为这个集团的头面人物。

但是，从历史事实来看，根据当时国内、国际上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江青以她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身份，“四人帮”其他成员是围着江青转的。经过我们后来的讯问和大量的事实印证，证明广大群众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王洪文、张春桥在公开职务上固然比江青高，但他们都称江青为“中央首长”。她这个“中央首长”在他们那帮人中，也是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也是定弦的。诚然，这里存在着这帮家伙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内心里并不一定看得起她。不过，从政治能量上掂量，她终归是他们的“中央首长”。

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在审理工作展开时，专门就此进行了研究。后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按实际情况，让江青挂了头号；张春桥作为“智囊”和“军师”，挂二号；姚文远制造篡党篡权的夺权舆论，算三号；王洪文以流氓打、砸、抢活动起家，虽当上了副主席，但一直是个吃喝玩乐，成事不足的人物，放在了第四位。这种定位，是符合“四人帮”阴谋信团的实际，合情合理的。

### 一、江青：斯文不了多久便胡搅蛮缠

在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等“四人帮”集团主要成员讯问的过程中，我们多次来到对他们实施隔离的住处。那里背靠青山，林木环绕，鸟语花香，环境相当不错。

“四人帮”主要成员在这里的待遇也超出我们的想象。他们每餐有一荤一素一汤；每星期发给二斤水果（苹果、梨、桃、橘子），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奶，吃一顿饺子，餐餐都供应大米饭和白馒头，任其自选，管饱。他们的伙食标准是每月30元，约高于当时我们这些机关干部食堂伙食费的两倍，加之地处农村，农产品和鱼肉鸡鸭价格都很便宜。

谈话前，我们先通过隔离房外的了望孔，对“四人帮”主要成员做了一番观察。



江青的头发是墨黑墨黑的，很多，很浓，完全不是外面所流传的说她是个秃子，戴着假发；她的体态丰满，看上去只有50多岁，也不是像外界所流传的她在自己身上，这里用了橡皮垫子，那里用了橡皮垫子。社会上流言之谬误，社会上流言之不可信，虽则反映着广大干部、群众对江青的仇恨，但终归是不合乎实际的。

后来在一些聚会上，常有人因为得知我的这段历史，向我询问有关江青的情况，凡涉及到人身侮辱性的传闻，我都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说明。我认为跟“四人帮”的斗争，是政治斗争，是严肃的事情，搞那些败坏对方的小动作没意思。

被隔离的江青用餐时，总是用瓷勺盛了米饭，再用筷子夹一箸荤菜，一箸素菜，盖在勺里的饭上面，大口大口地吞食，颇似上海饭馆里吃盖浇饭那样的吃法，且吃的非常香。后来在询问过程中，江青对我们说，她之所以要吃好养好，为的是跟我们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

整个讯问谈话期间，和江青的交锋是比较多的，那情景难以淡忘。每次找她谈话时，她都要换上干净衣服，总是抱着一叠材料，拿着水杯。到场后，先把材料放在左边，再把水杯放在右边，然后端坐在专门为她准备的瓷凳上面，然后用双手往后捋一捋头发，搓搓面颊，还以两手的食指用力地在鼻沟处挤一挤，稍稍仰起下巴，开口说：“开始吧。”仿佛是她主持会议一样。然而每次都这样斯斯文文地开始，可说着说着就无理取闹起来。

最初见面时，江青见我们几个人衣冠寻常，也没有哼哼哈哈的官样腔调，就先向我们摆起谱，端起架子来：“你们要问‘文化大革命’的事么？告诉你们吧，我所参与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务；我所经历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治生活，这些都是高级政治人物的活动。这些，你们能问么？敢问么？我说出来，你们敢听么？所有这一切，你们敢干预么？敢管么？敢么？敢么？敢么？敢么？”

我当时感到，一定要震慑住她的嚣张，以后的讯问才能顺利进行，便严词指出：“江青，我们是中央派来审查你这个案子的，这个问题首先你必须认识清楚。因此，有关你和你的同伙的一切罪行，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向我们交代。你不交代别人要交代，别人交代了就不算你的交代了。凡是涉及到你们所犯罪行的一切事件，一切人物，所有情节，我们都有权利问，有权利听，有权利管。”她的气焰被压住了一阵，可过了一会儿又发起进攻：“毛主席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你怎么看？”

“林彪是你的好朋友吧，你跟他一起搞了文件，你还专门为他拍了假装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你怎么说呢？”我们反问。“我是反对林彪的！”她嗓门提高了。我们随即点出：“那是因为后来你们互相争夺权位！”她顿时语塞。

接着我们说：“按照你讲的，你总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你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呢？”她急促地喘着大气，不服气地自言自语地说：“哼，这是毛主席说我的话，你们又用毛主席说我的话来整我！”

“我还是有朋友的，我还是有知心朋友的！”她又嚷嚷起来。我们问：“哪一个算得上你的知心朋友呢？”她想想，撒泼耍赖说：“我不能告诉你们，告诉了你们，你们又可以去抓人啊！刽子手！”

虽然谈话时这种情况居多，但也不全是如此。有时候江青会突然软下来对我们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你们打狗也得看主人啊！”其中含有乞怜的意味，当然也含有把责任往毛主席身上推的用意。

尽管江青的态度恶劣，但审理领导小组还是尽最大努力，争取她能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为此，几位审理领导小组的成员，如中纪委副书记张启龙，30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李士英、曾汉周、于桑等人在我们陪同下，一起去看江青。

张启龙已经80多岁了，曾是延安时期高级党校一部主任。江青曾是党校的学员，张启龙可以说是她的老师和领导。见面时，张启龙要江青实事求是地认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坦白自己的问题。

不料江青马上蹦了起来，伸出拳头高呼：“打倒走资派，打倒走资派，我就是要打倒你这个老走资派！”她清楚张启龙的历史。他原来是湖南的一个小学教师，在秋收起义前参加革命，后参加朱德、陈毅在湘南领导的暴动，随之到井冈山，又经过长征到陕北，始终就给他定性为走资派。

我见江青近乎疯狂的举动，怕她伤害到老人，就吩咐看管人员：“马上把江青带下去。”几个女警卫战士随即把她押送回她的房间。

说到女警卫战士，我们发现江青最记恨的就属李红了。她几次向我们提出要把李红从她身边调开。原因是李红威胁、谩骂过她。我们经过调查，得知了事情的原委：

有一天，江青对李红说：“搞修正主义，主要是你们上头的人搞的。至于你们下面的，是个执行的问题，我对你们并没有什么意见。”继而她就开始诬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中央领导，说某某“搞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那还不是修正主义吗？”

李红当即对她进行了反驳，并对江青说：“你现在首要的是老实交代罪行，好好改造自己。”江青被激怒了：“我看你就是个参加天安门事件的小反革命分子。”李红哪吃这一套，反斥江青：“你是流氓、叛徒、坏东西。”

这下把江青气急了，扑上来就要抓扯。李红也不示弱，顺手拿起一把大扫帚，喝道：“你敢再胡闹，我就把你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江青被李红横眉立目的样子震慑住了，忙改口说：“好了好了，我刚才只是跟你说着玩的。我们有意见分歧，但还是好同志么。”

从那以后，江青再没和李红直接冲突，但背后反复向管理部门要求不要李红当值，说李红来她就不放风、不吃饭。但管理部门没理她那一套，当然，她也没因此而放弃了吃饭、放风。可得着机会，她便重提调开李红的事，我们也没有答应她。

除了胡搅蛮缠外，江青还常向我们告别人的状。一次她说起在隔离审查初期，曾对她搞了武斗。我们听闻后十分重视这件事，严肃地认真进行了调查了解，查清了事情的真相：那是在“四人帮”刚被隔离的时候。当时负责专案的人，组织原来在江青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人员、医生、护士、厨师、司机等，对她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揭发批判。

当然，这些同志不可能揭露出江青等人犯下的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只是例举出她平日如何飞扬跋扈，压迫凌辱身边工作人员的劣迹。从未遇到过这种待遇的江青忍不住了。当她的秘书刘玉真指责她往日的恶劣作风时，她伸手就打了刘一个耳光。

殊不知彼一时此一时也。过去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蔼可亲，宽厚仁慈，谁家有困难，都给予关心和帮助。江青当着主席的面，也不敢对工作人员耍威风；即便她是背着毛主席发淫威，工作人员们都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对他忍让、迁就。而此刻，江青已变成了被揭发者，还动手打人，岂能容忍。大家群情激愤，便一拥而上，发生了与江青撕扯的情况。

批判者人多势众，江青孤家寡人，撕扯中肯定是要吃点亏的。虽然事情的缘起是江青先动手打人，但动手终归有违背党的一贯政策，我们遂视此为一个教训，以后不再面对面的揭发批判会了。

为了查清问题，我们一次次地与江青面对面地交锋。依我看她当时是很愿意谈的，因为一个风光一时的人，突然与世隔绝，没人作她宣泄的对象，她很不习惯，很寂寥。

一般情况下，谈话时江青说什么话，我们都不打断她：她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我们也让她讲完，看她怎么歪曲、怎么颠倒的。只是对于我们已经充分掌握事实、掌握证据的问题，才在关键时刻点她一下，使她自感蒙骗不能得逞的难堪，自感狼狈。对她对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诬陷、谩骂，则严肃指出，用事实予以批驳，据理打掉她的侥幸心理。对她的挑拨，甚至意欲搞思想上的“策反”那一套，则给予回击。

江青这个人，从过去上海的十里洋场，帝国主义分子、冒险家的乐园熏陶出来，脸色善变。不论在讯问过程中她显得多凶，撒泼何等厉害，临到闹完了，她就恢复了平静，站立起来，一丝不苟地收拾起她带来的材料，夹在身上，端起水杯，向我们一鞠躬，面露微笑地道一声“谢谢”，才转身离去。

## 二、张春桥开始也并非一言不发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春桥总是以“左”的面目出现，诬陷我们的许多干部是叛徒、特务；但另一方面，却利用其篡夺的权力，伙同姚文元、王洪文，竭力包庇自己的妻子——叛徒、特务、汉奸文静，让文静担任了“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材料组、联络组的负责人，抓动态，管专案。

他的妻子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工作时，被日本侵略军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军特务，到处为日军做策反工作，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战争。张春桥对此心知肚明。他的妻子文静交代说：“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1946年结了婚。”

“文革”以后，张春桥与江青关系日益密切，常常深夜不归。文静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一些轶事的，出于这种完全属于个人的原因，她对张春桥不放心。张春桥就安抚文静说，他要通过接近江青，去接近“最高”，他准备成则为王，败则砍头。由此可见王、张、江、姚的勾结，是出于一种什么目的。

在公开审判时，人们通过电视转播都看见了，张春桥自始至终一语不发，藐视法庭。但在最初讯问谈话时，他可不是像在法庭那样，以不语应万语，而是谈了一些事情。

例如，1974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江青借“风庆轮”的问题，在政治局闹事。当邓小平不软不硬地加以抵制时，张春桥阴冷冷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

会后，王、张、江、姚立即聚集到了钓鱼台17号楼，连夜密谋策划，决定背着正在北京医院治病的周恩来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由王洪文秘密赴湖南长沙，诬陷邓小平要搞复辟；诬陷周恩来在医院会见探望他的老同志，“大有庐山会议之势”。

在我们找他讯问谈话时，张春桥和姚文元、王洪文一样，都交代说他们当时是看周恩来因病不行了，要全力“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当张春桥说到这儿时，我们突然发问：“你们在准备搞了周总理、邓小平以后、由谁来当第一副总理并在以后接替总理呢？”张春桥毫无戒备，吞吞吐吐说：“他们（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的意思是要我来。”

张春桥这一漏嘴，我们顿时感到捕捉到了关键问题。因为说谁有错误，要打倒谁，他们一直都往毛泽东身上推，只承认是认识上的偏差，是执行中的错误；可这一句话，张春桥露出了他们拱倒别人，与安排自己位置相连，搞阴谋，想篡权的野心昭然若揭。

从这次交代以后，老奸巨滑的张春桥这才发觉自己对答有失。他怕再有不慎，授人以柄，从此缄默不言。

### 三、姚文元：把责任都往毛主席身上推

在那段日子里，姚文元表现的特点，就是竭力把他们的一切问题，都推到毛泽东身上去。他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完全是被动的思想、被动的行动、被动的执笔人物。

每问及一些和他相关的问题，他总是说毛主席怎么指示他的，他就是怎么做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去写的。他的文章，都是送给毛主席修改，大段大段的增删。因此，煽动十年内乱，乱中夺权的错误和罪行，似乎都不是他存心犯的，而只是个执行的问题。

他还故意在我们面前表现得对党、国家、人民的命运和利益十分关心的样子。他听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粮多了，肉多了，鸡鸭鱼蛋丰富了，一律敞开供应了，不像“文革”后期那样，全国没有肉吃，全保障北京，北京一人一月也只发二斤肉票，零售一个人一次只能买两毛钱的肉。对此，他貌似关切地说：“请代我向中央领导同志转达转达，这样可不行啊，可不能敞开供应啊！敞开供应，几个月吃光了，怎么办呢？不要造成形势不稳啊！可不能出现1958年以后和文革后期的那种状况啊！”

姚文元的这一假面具，必须予以揭露。一次，我们专门以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和天安门运动为题，找他谈话。我们问，“把许多人参加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你说是不是错误？”

开始他说：“是错误，当然是错误。”他还发挥说：“特别是还栽到邓小平头上去，跟他无关嘛，更是错了。”可马上他话题一转说：“当时，是毛主席定下来的，大家都遵照毛主席说的去做了，也没有办法。”

在这件事情上，究竟是毛主席的错误决定影响了他们，还是他们的行为，影响到毛主席做出了错误决定，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关键问题。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他不可能洞察一切。当他对一些虚假的事物看不清楚的时候，当他听信了虚假的汇报时，当他的指导思想脱离了实际时，他也可能产生片面性，产生偏执，把假象当成真相，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采取错误的决策。

据江青、王洪文等人的交代，以及一些当事人的揭发，1976年4月4日下午和晚上，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些人惶惑不安，时而在会上说几句，骂几句，时而透过大会堂的玻璃窗，观看天安门广场的现场。

到了夜晚，“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社担任总编辑的鲁瑛，召来派到天安门广场上的记者。他们反映天安门广场上有人发表演说，痛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祸国殃民。

江青听了，又哭又闹，还拿一根棍子在会议厅里东挥西打；张春桥、姚文元紧跟着张牙舞爪，要求镇压；王洪文跑来跑去，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华国锋定了性，说天安门运动是“反革命分子的捣乱破坏”。

于是，会议决定由毛远新、华国锋按这个调子，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汇报，才作出了把天安门运动定为反革命事件，认定邓小平是这一事件的总后台的结论；要吴德去讲话，发布了两项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的决议案。

对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起初是准备派部队镇压的。后来，才决定由×××调动民兵，组成棒子队、棍子队，四面包围，进行毒打和搜捕。姚文元说他们完全是在毛泽东指示下干的，可就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而论，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为了揭穿姚文元的谎言，我们当场出示了他在当年3月下旬所写的日记。在那些日记里，姚文元就把早在天安门运动发生之前，因为当时《文汇报》造谣：“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要把另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扶上台”，恶毒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而引发的南京市人民群众的示威行动，以及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群众“沉重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活动拧在一起，斥之为‘反革命’”。他在日记里恶狠狠地写道：“要镇压！”“要杀人！”

我们还出示了4月4日晚，华国锋、毛远新在向毛主席汇报之前，姚文元亲自批改的《人民日报》内部情况的文章小样，这里也早就把天安门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据此我们指出，正是他们炮制的一系列歪曲事实真相的材料，导致了毛主席在这件事上的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

面对铁案如山，姚文元满面通红，头上热汗淋淋，瞠目结舌，吱吱唔唔话不成句，不得不承认自己“罪行严重，罪行严重”，思想上是与“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人民群众对立的。

还需要说明是：在整个审查工作的谈话当中，姚文元虽则是口吃而不能畅言，但他在答问时，不仅每句话都字斟句酌，而且是吐字清晰的。他一直只承认自己有错误，只有在这件事上，才自谓“罪行严重”。

四、王洪文：他人说得详尽，自己避重就轻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抢、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认是“顺潮流，赶浪头，逞威风，成一霸”的。他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都没有，只不过从广播上听到、从报纸上看见几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的字句，接过来喊叫，居然最后混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的地位。

在讯问谈话期间，我们发现他根本说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什么叫作修正主义，怎样算“左倾”，如何属于右倾。他由中央委员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仅广大干部群众认为荒谬，连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梦也没有想到”。

就连在“四人帮”内部，他也被其他三人骂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挥霍国家财产，搞生活享受上，他却是后来居上。他一个人在北京和上海就占有九辆汽车；到外地，当时他坐飞机，还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国内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为他推拿一两个小时。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一日三餐，顿顿鸡鸭鱼肉还嫌不够，要吃燕窝，法国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汤等，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平日里，他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打扑克、下棋、钓鱼、找猎、看黄色电影和淫秽录像上头。他还发明了一种摔手表的游戏，一边玩一边说：“反正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钓鱼，要有好几个女护士服侍左右，为他打伞遮阳，并剥了橘子一瓣一瓣喂进他嘴里。每当有文件或送批的报告来了，他都让秘书廖祖康代看文件，并替他在文件上画圈、批字。

在交代问题时，王洪文称他的人生中有两个想不到：一个是青云直上“想不到”，一个是转眼变成被审查对象“想不到”。讯问中他说他得了一种瘧病，时而感觉千军万马，时而冷寂心慌，时而静得可怕，时而两耳雷鸣，大约就是这种暴涨暴落留下的后遗症。不过，据我们观察，在交代问题的绝大多数时间，他的神志还是清醒的。

一般情况下的表现，王洪文表现得很愿意交代，比较老实，比较温顺，很有愿意悔过认罪的样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问题，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他把邓小平在江青的质问下如何顶撞江青，江青怎样大发雷霆，张春桥污蔑邓小平“又跳出来了”；他们四人如何相约去钓鱼台十七号楼举行秘密会议，作出了妄图阻止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决定；以及当晚他回去就寝，接了好几个电话，怎样密调三叉戟飞到长沙，毛主席如何斥责他们；以及因心情不舒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长沙多住几天，买了许多橘子，就飞回北京，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有王海容、唐闻生一边吃橘子，一边发牢骚，都说得很清楚，很详细。

但是，他对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诬陷周总理，说什么“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却不正面答复，只是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地耍花招说：“我那次谈到了周总理吗？我没有提到周总理吧？我会说周总理吗？好像我只说了邓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当问他为什么去长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医院的周恩来汇报时，他装作吃惊地说：“哎呀，这么重要的问题，我怎么当时就想不到了呢？我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呢？”一副既要装老实，又想要滑头的丑态。

另一次，我们就王洪文利用所谓“伍豪事件”整周恩来之事，找他谈话，他再度在我们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1932年，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策划下，上海的《时报》于2月16日、17日，《申报》于20日、21日，连续刊登了一个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以此来瓦解共产党，破坏周恩来的名誉。这时周恩来已到了江西中央苏区，上海的中共组织随即在2月22日《申报》上登出启事，意在辟谣。2月27日，又在我党创办的《实报》上刊登伍豪启事，戳穿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阴谋。3月4日，中共又通过《申报》刊登《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的紧要启事》，进一步辟谣。

这本来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来。江青集团如获至宝，要用国民党机关制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经破产的谣言，来诬陷周恩来，从而制造一个打倒周恩来所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型炮弹”。

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有了解当时情况的同志，用事实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和江青从不同角度诬陷周恩来的问题，给予了有力批驳，并且点着当时装着闭目养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这才承认了事实，点了头。毛泽东当时做结论说：“这件事情已经搞清楚了，是国民党制造的谣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经作了结论以后，还下令给他在上海图书馆的小兄弟，要他们继续搞有关“伍豪事件”的材料。

当我们讯问此事，王洪文对他曾在毛主席已经对“伍豪事件”作了结论后，仍然借此整周恩来的事实矢口否认，还赌咒发誓、捶胸顿足地说他“绝对不会反对周总理。”

对他的抵赖，我们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结论的政治局会议后，他本人还要搞“伍豪事件”的亲笔批示。面对证据，他紧张得大汗淋漓，尴尬不堪地自言自语说：“我，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还，还有这样的批示呢？我，我怎么会……？”

我们追问：“这是不是你自己写的呢？”他见白纸黑字，再无法推脱，不得不说：“这，这倒是我，我的字……”

## 五、毛远新：先是抵触，后有悔悟

积极参与了“四人帮”集团阴谋活动的、特别是在“文革”后期担负着中央政治局与毛泽东沟通的联络员重要角色的人物毛远新，社会上曾有一些关于他在讯问谈话期间态度挺不好，尽把责任往毛主席身上推，自己什么责任都不担的传闻，但这不够准确。经过一段时间做工作，毛远新的态度是比较好的，若不是他的配合，许多问题查起来就很麻烦，且要耗去更多的时间。

“文化大革命”之初，毛远新在黑龙江省的伊春市，当时他还是主张对干部的问题要实事求是，反对怀疑一切，及打、砸、抢、抄、抓的做法。后来，他发现自己的认识，同毛泽东基本错误估计形势而形成的思想有矛盾。在和毛泽东交谈时，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他的观点随之有所改变。

这以后，他去吉林省延边地区，就指挥造反派和军队，血腥围剿和镇压了持不同观点的群众，狠整朝鲜族的各级干部，成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罪魁祸首之一。他当上了沈

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负责人后，实际上成了东北地区的太上皇，甚至陈锡联、曾绍山等人，也要唯毛远新的马首是瞻。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已经开始对毛远新进行保护审查。由于当时的专案组在审查中袭用了“文革”中的某些做法，大哄大嗡，硬挤硬压，严厉斥责等，尽管毛远新搞这套名堂也是老手，但别人用类似这些他熟悉的手段对付他，他也受不了。在那段时间里，他一言不发，采取了硬顶的态度。

我们接办这个案子后，严格遵照审理领导小组的指示，采取党内审查的谈话方式。对清查的问题，一律从他们犯错误和罪行时的特定环境、条件出发，实事求是，不强加于人；在与之谈话的过程中，采用探讨的方式，说理的方法，既耐心听取他的意见，也说出我们的看法；我们与他有了不同的观点，宁可等待下次、以后再继续谈清楚，也不顶牛，不争吵。

经过若干次交锋，毛远新不仅开口说了话，而且动笔写了交代材料，他自己得出的结论：“文化大革命错了，完全错了，彻底错了。”

他在谈论自己的实际感受时说：“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贯穿着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群众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与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有时是公开讲话中就有差异，更多的时候采用各人都引用毛泽东的话，但引用的内容不同，说出的道理不同，结果是以各说各的，各干各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搞颠倒了，使国家落后的15年到20年，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害遭殃，使党和国家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在整个讯问谈话期间，我们对江青和其他被隔离审查对象的正当的、合理的要求，还是遵照领导上的指示，尽理予以解决的。

我们不仅在谈话时，主动过问他们吃得怎样，睡得怎样，学习怎样，还需要什么；而且叮嘱管理他们的同志，把他们的生活按规定标准搞好，晚上要关掉刺激眼睛、影响睡眠的强光灯。管理人员也经常征求这些人对伙食、卫生、医疗方面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我们了解到他们对报纸、杂志的需要，就增发了报纸的杂志。

许多重要的审查对象，他们对党在生活上、学习上的关怀和照顾都表示感激，痛悔他们过去对我们许多老红军、老干部、高级民主人士的折磨。

对于一些一时难以马上解决的生活问题，我们也向他们做解释说明。如江青提出奶粉冲的牛奶不好，希望改成鲜奶，当时供应鲜奶还不能立即实现，只能让好先将就一段。

然而对他们提出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我们也说明情况，不予同意。如江青提出，她住的房间，休闲活动和晒太阳的场所，各14平方米，太小了，她要求扩大到各28平方米，共56平方米。我们明确告诉她，这办不到。但是，对于她要求从家里拿些衣服来穿，拿些东西来用，我们还是满足了她的。

还有一次，江青在谈话时突然对我们喊道：“我要平等！”我们问：“谁对你不平等啦？”她说：“那为什么我的桌子、椅子、床都矮一截？”我们告诉她：“那是为了安全，怕你从上面掉下来摔坏。”



“给我换掉！”江青声调更高了。“那不行，所有的人都如此，否则不安全。”“什么安全不安全，给我换！”“不可以。”我们平心静气。“不给我换就是不平等。我要平等，不要什么安全！你们混蛋！你们是邓小平的帮凶、刽子手！”她尽管这样嚷嚷，但我们是绝对不会迁就这种无理要求的。

□ 来源：中共党史网

~~~~~  
【理论研究】

## 超极权：文革研究纲要（五）

• 吴 思 •

（上接 z k 2 0 0 4 b）

### 五、超极权运动的多重背景

#### （一）超极权设想与毛泽东的经验背景

##### 1，军事组织的成功经验

（1）在“五七指示”中，毛泽东两次提及自身经验。

开篇说，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

结尾再次强调：“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2）在谈供给制和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时，毛泽东也多次提及自身经验。

1966年12月，毛泽东说：“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就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也忘了。是不是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20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从几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上是过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革命精神鼓舞。”

（3）显然，毛泽东的社会改造蓝图，无论是初级版还是高级版，都来自战争时期军队和军事化的党组织的成功实践，来自他本人的成功经验。

后来的人民公社、大食堂等军事化组织和军事化生活方式，大跃进，大会战，不同阶段完成不同任务的各种运动，再现了这种组织及其取胜策略。

##### 2，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经验

如果理想遭遇反对者，运动受到阻碍，就是遇到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对手。在这方面，毛泽东也有一系列获胜经验。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党内历次路线斗争，再到建政后的历次运动如反右和反右倾，毛泽东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各个击破，从胜利走向胜利。他概括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对毛泽东来说，战胜阶级敌人和路线斗争的对手并不难。真正难对付的，是敌对路线背后的道理。反对者消失了，一路畅通无阻了，大饥荒来了。

大饥荒造就了更多的质疑者和反对者，他们在党内级别最高的代表，被看作中国赫鲁晓夫。不仅要打倒这些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还要防修反修，全民联防，建立反修防修的体制。

走资派被打倒了，质疑者闭嘴了，道理还在，人性依旧趋利避害，依旧趋向能够创造更多利益的制度。障碍一去，全民革命便转向全民致富。背离人性的防线无人守护。

### 3，经验的欠缺

（1）毛泽东只有少年时代的部分农业生产经验，缺乏工商业方面的亲身经验，缺乏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生活经验，自然妨碍他对以分工为基础的现代文明的深度理解。

“五七指示”和军事共产主义主张，如此漠视分工和专业化，如此敌视商品市场和货币，不仅来自成功经验和失利教训，也来自经验教训的欠缺。

#### （2）超极权运动拖延的原因

在1968年10月举行的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解释为什么文革持续的时间比预期长。

毛泽东说，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也只有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省解决。

### 4，经验对比带来的不满

毛泽东对极权体制和官僚体系的不满，来自亲身经验的对比。

1967年4月2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会上说：“（三结合）要有群众参加。十几年了，我们脱离了群众。四九、五〇、五一、五二年，群众欢迎我们。那个时候干部吃住很简单，吃小米，住帐篷。进城后搞薪金制，群众就不欢迎我们了。”

“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要把它改变过来。”

1965年1月，毛泽东读陈正人的调查报告，看到一部分老干部，脱离群众监督，当权后为所欲为之类的黑暗面。毛泽东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如果不搞三同，必然会被工人阶级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毛泽东看到的当然是事实，但只是二级事实。民众确实喜欢清廉、厌恶腐败，但更喜欢发财，更厌恶贫困。

## 5，世界大势中的个人经验

与19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相对照，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功经验，吸引了一代知识分子，形成了世界范围的历史潮流。

## 6，毛泽东的认知模型

（1）在长时期大规模的战争实践中，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成功实践中，毛泽东形成了独特的把握世界的认知模型，这就是战争模型。提炼到哲学高度，这个模型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在对立统一中，强调对立而不是统一。一个吃掉一个，战争解决问题。

这种认知模型，很适合战争年代，适合逐鹿中原，于是他从胜利走向胜利，思维模式愈发成熟稳固。

这种认知模型，在文革时代，体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六个理论要点的第一条，就是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世界。第二三四条谈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毛泽东继续把世界看作战场。路线斗争阶级斗争，都属于战争模式。

毛泽东坚信，他掌握了历史规律，遵循这种规律，凭借组织的力量和阶级斗争的手段，他可以建构一个新秩序，创造一个新世界。

（2）在和平和经济发展的年代，成败由市场竞争决定，不由战争决定。

在市场经济中，政治斗争也被解读为公共物品的竞争。如果刘少奇的极权路线比不过毛泽东的超极权路线，那么，全国人大或中央委员会可以选择毛泽东路线。如果选错了，还可以改回来。无论如何选择都是合法的，没有必须消灭的阶级敌人。

市场模型，在哲学高度，就是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里讨论的自由秩序，又称合作的自发扩展秩序。这种秩序可以抽象为进化论模型或生态均衡模型，但禁止暴力掠夺，好比剔除了肉食动物的生态系统。这个模型之中，只要不犯罪，每个人，每种生存策略，都有合法存在的权利。

在哈耶克看来，人类的知识非常有限，面对复杂多变的自发秩序，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即使有人掌握了科学定律，由于具体情景方面的知识不足，也无法预测未来。人所能做的最好选择，只是坚守一条自由原则，让每个人自由地应用自己的知识和努力为自己创造福利。

（3）这两大类思维模式，恰好就是极权与民主宪政这两种体制背后的两种世界观。

极权主义的拥护者把世界看作战场，用战争思维解决问题。民主宪政的拥护者把世界看作市场，用生意的思路解决问题。威权在两者中间，政治上近似战争模式，经济上近似市场模式，属于两种模式并存的思维模式。

不同的思维模式，适合不同的环境，也适合不同的生存策略。一旦错位，就会出现适应环境的难题，就可能连连碰壁。

## （二）超极权与官家主义传统

### 1，官家主义

（1）“官家”，在汉语词典中有三项释义：一皇帝，二衙门，三官员个人。“主义”有两项释义：一是某种制度体系，二是某种理论体系。

（2）在中国历史上，谁是制度体系的主导者？首先是皇帝，他制订王法；其次是衙门，各地和各系统的政府权力部门制订部门法规和地方法规；再次是官员个人，他们凭借代理的权力，建立潜规则体系。这三个主体相互争夺地盘，但主导规则制定的，拥有否决权的，始终是官家集团。官家主导建构的制度体系，就是官家主义。

（3）官家集团的核心，是打天下坐江山的暴力集团。这个小集团的首领和大股东是皇帝，小股东是少许世袭贵族。他们是天下江山的主人。官员是他们雇佣的代理人。

（4）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废除了众多封建王国架着一个共主的封建主义制度，建立了皇帝委派代理人管理郡县和中央部门的官家主义制度。两者之不同，类似商会与垄断公司。

官家主义制度中的封建贵族，通常是有名无实的、没有军队地盘和实权的、食禄而不管事的“虚封”贵族。

（5）官家集团，与毛泽东所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或党内资产阶级，都以行使权力即合法暴力作为主要生存策略。列宁所定义的阶级，可以看作不同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不同生存策略的载体。

如果扩展阶级的定义，接纳暴力要素或破坏力要素的拥有者，把凭借暴力或权力掠夺生存资源看作一种生存策略，那么，暴力集团打天下坐江山之后，股东及其代理人集团便是官家阶级。（16）

### 2，极权主义与官家主义同构

（1）极权政治有三层结构：领袖、干部、群众。官家主义也有近似的结构：皇帝、衙门和官吏、民众。

（2）超极权试图建立三角结构：领袖是顶角，干部和群众是两个底角。干部群众彼此监督，共同向领袖效忠。中共建政之前，在土改运动中“搬石头”，早有动员贫雇农踢开基层党组织直接土改的先例。

在官家主义历史传统中，皇帝也曾尝试发动民众监督官员。明太祖朱元璋颁布大诰，授权民众直接将违规扰民的官员押送京师。不过，强势皇帝去世后，这类制度难免人亡政息。

官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三层结构都可以成为超极权三角的基础。只要最高权力足够强势，就有可能提高民众的位阶，同时压低官员的位阶。

皇权至高无上，因为皇帝是真命天子，“奉天承运”。最高领袖也有类似的地位，因为马列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掌握了历史规律，他们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

### 3，官家主义的传统和当代难题

在中国历史中，官家主义的大一统王朝，40%死于民变，40%死于官变，20%死于外敌入侵。其中，官变又包括皇亲国戚之变、各类衙门或官员之变。官家主义的传统危机，在极权制度中愈发突出。

#### （1）官变：来自官家集团内部的不稳定

1.皇权稳固及最高权力传承，这是官家集团内部的第一号问题。官家主义用世袭制有效地解决了最高权力传承问题。

在极权制度中，世袭制失去了意识形态支持，最高权力传承制度转化为接班人制度。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极权和威权道路相互竞争，最高权力传承，往往导致发展道路的调整。因此，最高权力顺利传承，同时防止根本路线改变，成了极权制度中的头号难题。这个问题被表述为身边的赫鲁晓夫问题、篡夺最高领导权问题。从毛泽东时代开始，这个问题一再掀起风波。

指定接班人规则本身也不稳定，随着打天下那代人的逝去，这种规则将随指定者权威的减弱而减弱，寻找替代性制度已成当务之急。

2.各个地方和部门与中央对抗，这是官家集团内部的第二号难题。条条块块闹独立，可能导致藩镇割据，架空皇帝，甚至封建主义复辟。

极权制度存在同样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从中央一直到基层支部，到处都是独立王国，土皇帝很多。条条专政，块块专政，很多政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3.官员个人腐败，利用代理的权力追求私利，这是官家集团内部的第三号难题。毛泽东认为，在极权制度下，干部脱离群众，有特权，早晚有一天要变成人民的敌人，被人民推翻。

#### （2）民变：官民矛盾造成的不稳定

在极权体制下，民众对各级官员的特权、腐败、不公、霸道普遍不满，但这只是次级不满。

在毛泽东时代，最大的官民矛盾，是民众与毛泽东的极权和超极权道路的矛盾。民众倾向“三自一包”和“物质刺激”，刘邓路线容许，毛泽东反对，并发动民众批判走资派。毛泽东本人，作为民众权利和利益的最大侵犯者，反而是不容置疑的。

民众对官员的不满、对平等的追求，被超极权运动充分利用，次级不满得以发泄并缓解。但官民的基本矛盾却在加剧：经济自由越来越少，财富产出越来越少，文革内斗破坏了经济秩序，加重了民间负担，于是民众贫穷，官方也陷入财政困难。

超极权秩序的基础越来越脆弱。

#### （3）外部威胁

毛泽东的时代，是两个阵营对立的冷战时代。建政初期，外部威胁多少是存在的。文革时代，中国已经有了核武器，外部威胁并不严重。

真正的外部威胁，还是发展模式的示范效应。苏联东欧的发展模式，与欧美的发展模式，哪个更有吸引力？加入哪一种秩序？这是持续了百年的选择题。

一旦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极权制度又将面临普世价值的威胁。

#### 4，超极权：官家传统与共产主义理想的结合

（1）官家主义的传统难题，可以用民主的方式解决，毛泽东在“窑洞对”里表达了这种看法。

官家主义的当代形式是党国体制。官家集团信奉共产主义理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社会主义道路偏离民众主流意愿，与民主法治冲突。

既要借鉴民主制度解决官家主义的难题，又要坚持党的领导和极权制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夹击之中，便有了超极权方向的尝试。

（2）如前所述，在官家主义历史传统中，皇帝曾尝试发动民众监督官员。明太祖朱元璋颁布大诰，授权民众直接将违规扰民的官员押送京师。

在官家主义历史传统中，也可以找到中央文革的前身。为了保证君权对国家常规权力体制的反制，历代都在常规行政体制之外设立皇帝个人的亲信班子。汉代任用掌管宫廷文书的小吏“尚书”侵夺宰相公卿之权，最后“尚书台”成了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魏晋皇帝任用身边的宫廷小臣的“中书”起草诏书，宣达上谕，中书令继尚书令之后成了朝廷百官的首脑。这种最高权力的私人班子，在南北朝时是“中书舍人”，在唐代是“翰林学士”，在五代是“枢密院”，在清代是“军机处”。（17）

毛泽东的创造是，把亲信班子与民众动员结合起来，贯通为超极权三角的左边，制约右边的常规权力体制。

共产主义理想和阶级斗争观念，为这种贯通提供了解释和动力。

#### （三）超极权的近代史背景

##### 1，世界史中的道路竞赛

（1）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即所谓资本主义制度，造就了强大的帝国，冲击了整个世界。

（2）从不同的原始部落，不同的酋邦，到不同的封建王国，再到不同的官僚帝国，不同的文明和体制，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冲击的反应方式大不相同。一般来说，封建王国的现代化转型比较容易，官僚帝国比较困难。

所谓现代化转型，就是农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暴力集团主导的社会向资本主导的社会转型，并进一步向民众主导的社会转型。这是向更高文明的转型。

（3）英国创造的体制也有自身的问题和危机。市场和利润原则主导社会，贫富分化，经济危机定期发生，等等，这些问题和危机在世界范围内激起了不满。无产阶级不满、农民不满、知识分子不满、官家集团不满、封建贵族不满、宗教人士不满，各个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不满。社会主义思潮汇聚了多种不满，试图超越资本主义。

（4）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主要有三条。一是丧失了自主性的殖民地道路，二是最常见的威权道路，三是后起的社会主义极权道路。

极权道路来自对威权道路的不满，也来自对资本主义的不满，背后还有对殖民地前景的恐惧。

列宁改造的马克思主义，试图一举解决俄国的现代化问题和资本主义问题。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之中，苏联的社会主义或曰极权道路大肆宣扬自己的成就，赢得了众多的追随者。

（5）毛泽东坚决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极权制度中的物质刺激，反对超极权运动中的经济主义。中国的极权革命和超极权革命，全面抵制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性潮流。

（6）社会主义极权之路与资本主义和威权之路竞争的历史结论是：资本主义胜，社会主义败；威权胜，极权败。在同场竞争中，西德胜，东德败；南韩胜，北韩败；台湾反败为胜，大陆反胜为败。

竞争失败后，计划经济让位给市场经济，公有制让位给私有制，极权专制让位给自由民主或威权专制。

（7）社会主义的存在，刺激了资本主义的自我改良，社会民主主义在自由民主体制中发展壮大。极权道路的竞争，促使威权向民主宪政转型。

改良转型之后的资本主义和威权制度，不平等减轻，多元化增强，自由选择范围扩大，社会各界的不满减少，极权力量的根基进一步萎缩。

## 2，百年中国政治史的基本轨迹

（1）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起点，是高度成熟的大一统的官家主义帝国。

这种社会，首先不同于德国、日本那种封建色彩浓重的社会，没有众多独立且相互竞争的由贵族掌控的政治军事实体。其次不同于法国、俄罗斯和奥斯曼等处于开放竞争环境中的官僚帝国。再次，中国的儒家官僚，主要来自激烈的科举竞争，不像隋唐之前或俄国那样来自贵族世家。

这样一个能干的、全面掌握了政治军事资源的、闭关自守且自视甚高的官家集团，面对外部新文明的冲击，知识不足，担当不够，却有实力也有能力长期坚持强硬保守的立场。统治集团的强硬保守，正是温和改良派的沙漠，激进革命派的温床。

（2）官家集团内部发起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失败了，康、梁等边缘知识分子推动的君主立宪也失败了。作为一个整体，统治集团主导的转型失败了。辛亥革命发生了，体制内外联手，推翻了清朝。

在清帝国失败的地方，作为日本统治集团的封建贵族却成功了。日本没有大一统的官家主义，封建贵族相互竞争，尊王倒幕，废藩置县，拥戴天皇搞改革，明治维新迅速见效。

（3）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建立了有民主宪政包装的威权政体。在现代化道路上，威权的主体，往往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军队，或是现代观念较强的知识分子组织的政党。作为北洋新军的实际控制者，袁世凯和他的部下先后成为军事威权政府的首脑。但是，中国的军事威权，没有能力整合全国并有效治理国家。秩序大乱，重建秩序成为当务之急。

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军事强人凯末尔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在袁世凯失败的地方，凯末尔成功了。

（4）国民党建立的党国威权，提出了更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吸纳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在苏联的指导和帮助下，党国威权战胜了军事威权。一元化程度提升了。

但是，这个立足未稳的体制，内部统一尚未完成，又遭到外敌入侵，腹背受敌，秩序大乱，最终崩溃。

党国威权体制在大陆失败，却在台湾顺利运行三十多年，统治集团主导完成了现代化转型，包括民主宪政转型。

（5）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理想，比国民党吸引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在长期抗战严重消耗了国民政府的实力之后，在苏联的支持下，新民主主义——包含了共产主义极权前景的党国威权，战胜了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包含了民主宪政前景的党国威权。

革命成功后，共产党运用在革命中增强的组织、经验和力量，追求更远大的理想。1953年，刘少奇等人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被毛泽东斥为右倾。党国威权开始向极权过渡。过渡以暴力强制为基础，相关主体没有选择自由。

（6）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进入标准的极权社会。苏联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匈牙利事件暴露了极权的弱点，毛泽东有意超越苏式极权。

经济领域的超极权性质的大跃进，最初得到党内的狂热支持。导致灾难和饥荒后，引发了党内的路线争论。刘少奇、邓小平赞成三自一包，新民主主义倾向露头。（18）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击退三自一包，守住了极权性质的人民公社制度。此后两派斗争一直存在。

（7）文革不仅是毛泽东的防守反击，更是一场政治大跃进。文革的目的是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谓资本主义，就是在经济领域实行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这是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所谓修正主义，就是从社会主义或极权道路转向更重视物质刺激的后极权乃至威权道路。

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分歧，首先是超极权与新民主主义即威权倾向的分歧，其次是超极权与极权的分歧。官僚集团整体倾向极



权主义道路，部分倾向威权道路。这两种体制，都不受民众监督，都容许物质刺激。超极权违背官僚集团的整体利益，文革只能在民众中寻求支持力量。

民众之中，精英们有寻找意义的动机，受迫害者和被压抑者有翻身和报复的渴望，雄心勃勃的人有政治热情和政治进步的愿望，青年工人有摆脱枯燥生活的意图，一般民众也有对特权的不满、对平等和新增权利的向往。毛泽东时代压制所有异己政治组织，反而造就了一种政治生活的渴望。一旦放开，热情格外高涨。尤其是学生。在没有教会、工会、农会和各种实际利益组织的社会中，群众一旦兴起，而且有了政治正确的旗号，就没有任何牵制或竞争的力量。于是山洪暴发，淹没世界。

（8）最后，所有资源都掌握在最高领袖手中了，他最终面对的是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暴力革命、制度安排和思想灌输都无法改变人性，超极权制度解决不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问题，承诺的天堂一再显现为人间地狱。毛泽东的生命结束，超极权试验终止。

（9）文革结束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社会退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这种社会，近似新民主主义式的威权社会。初级阶段理论近似新民主主义理论，只是淡化了高级阶段，并把实现日期推迟到百年之后。

超极权运动意在巩固提升极权制度，结果却出人意料地加速摧毁了极权制度，启动了威权方向的改革开放。

从邓小平时代到胡锦涛时代，多元化水平逐渐提高，意识形态也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弱化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市场经济纯度向世界平均水平靠近。不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中国社会的多元化程度尚未达到民国时代的水平，尚未达到台湾转型前的党国威权水平。2016年，文革结束40周年之际，中国处在从超极权向极权再向威权过渡的半途，可谓半极权半威权社会。

（10）在1989年之前，中国政治的钟形曲线，从威权到极权再到超极权，然后回落，与苏联东欧的曲线，形状大体一致。顶端的超极权钟钮是中国首创的。

1989年之后，中国政治的钟形曲线与苏联分开了。中国在波动中继续回落，趋向威权水平。苏联则跨越威权直奔民主宪政，然后向威权社会回调。

（11）百年中国政治史的基本轨迹，大体呈现为一条有波动的钟形曲线：从传统的官僚威权上升到军事威权，上升到党国威权，上升到党国极权，再上升到超极权。失败后，一元化程度逐渐下降，从极权降到后极权，再降到半极权半威权，趋向党国威权。这条曲线的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权力一元化的程度及其控制的广度和深度。

反过来说，在应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程中，如果洋务运动和君主立宪成功，就不会有辛亥革命；如果袁世凯军事威权成功，就不会有后来的国民革命和党国威权；如果国民党的党国威权成功，就不会有后来的共产党极权；如果极权令人满意，就不会有后来的超极权试验。

最激进的革命，来自从改革到革命的一系列失败，以及接踵而来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

（12）上述不同体制的演变常规是：体制内外都有强硬派和温和派，在政治领域，在无底线竞争的条件下，温和派被强硬派淘汰出局。在强硬派主导的格局中，两强互动，组织强度和资源获取能力更高者胜。如此一路走向极权。

结论：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在战争及对抗性博弈中，威权的效率不如极权。

但是，在经济领域，极权制度下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把全国办成一家超级垄断公司，单讲效率就不如威权制度下的市场经济+私有制，更不用说资源配置和种种创新了。对比极权制度，超极权进一步放松了对管理者的行政约束，削弱了对劳动者的物质刺激，增强了政治对经济的干扰，效率更差。

结论：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在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中，超极权的效率不如极权，极权的效率不如威权。

注释：

1，极权主义的概念，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盛行于冷战时期。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页661，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威权主义的概念，胡安·林茨在1964年首次用于描述佛朗哥将军治下的西班牙的有限多元化社会，近似蒋介石治下的台湾社会。极权社会与威权社会的区别及非民主政体的分类问题，见胡安·林茨、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

2，《王力反思录》，页641，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下同）

3，王力，页673，文革是发动群众革我们这个执政党的命，不能由各级党组织统一领导。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认为我们是官僚主义旧机器，自己不解决，总有一天会成为人民的敌人。

4，王力，页1061，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毛泽东早就发现了，从中央一直到基层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它，什么事也没有，照常是模范，劳动英雄，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这是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他多次说，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抓人，放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打倒了。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

5，王力，页1061：毛泽东说，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要个自下而上的，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毛泽东至死还认为这是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堪与中国民主革命媲美的大事。

6，斯大林时代发起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是斯达汉诺夫在一个正常班的工作时间里采煤102吨煤，超过定额13倍，创造了世界纪录。这是定额导向的，强调业绩的，提高生产率的劳动竞赛。超额完成任务者可以得到奖金和其他福利待遇。中国的对应物是铁人精神。钻井队可以创造新纪录，但是，精神，革命精神，才是竞赛的要点。思想第一，而不是生产第一。这就是极权与超极权的区别。

7，唯物史观认为，自私自利之心是私有制的产物，是环境的产物。那么，换了环境，改变了所有制，人就可以成为大公无私的新人。当代经济学的观点正好相反：他们把私有制看作人性的产物。为了激励人的付出，激励人们承担风险、提高效率，必须允许他们占有这些额外付出带来的利益。所有权就是剩余索取权。

8，托洛茨基进而主张，无产阶级觉悟不仅要取代个人意识，还要深入新人的生理机制中的半意识。甚至使得下意识的生理活动也服从理性和意志的操纵。苏维埃新人，共产主义新人，普遍特征是：个人动机、利益、观点，个人意识消失，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集体的人，党的人。新人只有集体性和党性，没有个性。意志坚强，如机器一样整齐而有效率。见程映虹：《共产党革命如何塑造“新人”》，原载“共识网”。

9，和中共领导人一样，古巴革命领导人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等都是唯物主义一元论和环境决定论的信徒，在他们看来，人性中不符合他们要求的都是由旧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因此是可以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被消除的。卡斯特罗说：“从资本主义下过来的人充满了自私”，“彼此像狼一样。”他甚至认为人的进化在资本主义下停止了，而他的革命将重新启动人类的进化过程。格瓦拉说，“我们都是那个环境的产物”，群众并不是“单纯”的。他说：“我相信最简单的办法是承认它（指人性）的未完成性。人是一件未完成的产品。”见程映虹：《共产党革命如何塑造“新人”》，原载“共识网”。

10，斯提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第四章，人道主义革命。中信出版社，2015年7月第一版

11，8月23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召见外事口造反派头目，宣布：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中央、国务院。

12，王力，页901，毛的纠左措施。一是外出串联的要回来。二是临时工合同工的全国组织不承认。三是三线职工跑回来了，不行，要回去。四是下乡知青也要回到农村去。此外，不许冲击军事机关，公安机关，档案和机要部门。不能否定四清，不能影响春耕。

13，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1967·07—09。

14，王力，页1012，武装左派。1967年8月4日，毛致信江青。谈到武装左派，谈到群众专政。部队不可靠了，要搞第二武装。于是发枪，武斗。文攻武卫。毛认为75%以上的部队干部支持右派。公检法不可靠了，要搞群众专政，私设公堂，再加上专案组，比契卡还厉害。

15，杨继绳：《天地翻覆》，第十七章“清理阶级队伍”。香港，天地图书，2016年第一版。

16，这种与唯物史观不同的历史观，可谓血酬史观。

17，王毅：《“中央文革小组”生成和运作方式中的历史文化基因》，《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2000年第四期。

18, 1958年11月, 毛主持郑州会议, 学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 肯定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毛批评某些领导人急于过渡。毛还说, 要发展商品经济, 批评陈伯达把商品生产说成是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随后开武昌会议, 主张压缩空气。席宣、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简史》, 页52。这是一次毛泽东发动的纠左的会议。刘少奇对大跃进的态度, 开始落后, 后来比毛还激进, 受挫后的撤退幅度大于毛泽东, 而且诱过于毛。

□ 来源: 《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四)》, 美国华忆出版社, 2019年11月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